

【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社会主义】

现实中的神话

——以色列基布兹现象浅析

黄福武

(山东大学 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 济南 250100)

【摘要】基布兹是一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组织形式，是一个特殊群体在一个特定地域、特定时期和特定环境下对理想社会的一种探索性的实践活动。尽管基布兹运动在开创之初具有强烈的自发性、浓厚的民族性和直接的目的性，但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完善与自我更新，这一运动已经从一种朴素的思想观念转化为一种代表着人类未来理想的思想体系，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探索社会主义的基本组织形式尤其是农村生产组织形式的过程中，对基布兹这一奇特的犹太事物予以深切的关注并加以科学的分析和深入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关键词】犹太教；基布兹；社会主义运动；生产组织

【作者简介】黄福武，男，山东青州人，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研究员、山东大学出版社副编审，研究方向为犹太教与犹太文化。

【中图分类号】D1；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574（2006）03—0060—15

一、引言

就人类而言，对理想社会的探索历史就像人类自身一样古老。这样的探索一般采取两种形式：一方面，政治理论家和哲学家们以文字形式描绘出理想社会的景象，但他们并没有亲自尝试付诸实践；另一方面，有许许多多的劳动者，他们在理想信念的激励下，组织起来去建设自己的“乌托邦”社会。尽管这些梦想家与实践者之间有许多不同之处，但他们的梦想与行动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在“恰当”环境的滋养下，原始的人性可以形成这样的一类人。他们能够接近最高尚的自我。这一前提无论被视为天真还是实在，都无疑在提示我们，人类并不总是满足于实际的和现有的东西，而是随时会受到理想和新奇的驱动。也就是说，人类并不受生物或社会既有结构的限制，而是倾向于创造新的结构形式。基布兹（公社）的出现就正是这样一种形式。由于这种实践建立在自发的基础之上，因而能够创造出超越前人

的社会结构形式，在现实之中创造神话。

基布兹运动是伴随着犹太复国主义思想而产生的一种观念和运动，作为一种自发的思潮，其兴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与参与者的理想实现程度密切相关。从对第一个基布兹的怀疑，到对以色列建国后基布兹地位的再认识，再到对 20 世纪 70 年代基布兹一度繁荣的理解，直到目前基布兹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和问题，人们看到的往往只是一些表面的东西。其实，这种种表面现象和直观结果是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甚至军事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社会主义的中国，邓小平在总结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国两制”和设立经济特区的构想并付诸实施。在资本主义的以色列，却出现了一种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组织形式——基布兹，并且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这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思想实践模式的多样性，揭示了宏观制度与微观组织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与基布兹的兴衰相关的问题尽量作一个较为全面而深刻的分析，以期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某种借鉴和警示作用，正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人们普遍认为，第一个犹太基布兹建立于 1909 年。当时，这些未来基布兹运动的开拓者相信，他们正在为一个基于合作、平等和共同生活的崭新的犹太社会奠定基础。著名的哲学家马丁·布伯当时就用“乌托邦”来描述基布兹，既表示他们致力于创造一个公平和谐的“美好社会”的理想，也意指他们在一个集体社会中发挥作用的价值。他同时认为，这是一个非权力主义、自由主义或“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成功例证，并坚信，“只有一个全力创造的全面合作社能够证明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意义上的成功，这就是在巴勒斯坦建立的各种形式的犹太村社”^{[1](P14)}。他认为，“它在三方面表现出巨大的活力：内部关系、联合与对社会的影响”，同时他还指出，在建立犹太村社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不是空想，而是工作”^{[1](P142)}。这是从人类生存与发展角度对基布兹所作的极高评价，同时也阐明了基布兹的基本性质。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基布兹与我国从前的人民公社有相似之处，但与自上而下催生的人民公社相比，自下而上萌发的基布兹显然要成功得多。

基布兹的活力就在于它所具有的根本社会性质：努力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实现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完全和谐，促进每一个体的最大进步，并不断深化人的伦理关系。虽然从客观上讲，基布兹只是犹太人自发探索生存之道与理想之路的一种方式，但对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而言，它却代表了社会主义思想的一种实践形式。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基布兹经过了开拓自立、稳定发展、重心转移和自我完善等几个阶段，其中既有蓬勃与辉煌，也有衰退与挫折，但留给旁观者尤其是感兴趣者的，则更多的是借鉴与反思乃至批判。基布兹的产生有着多重的、深刻的思想基础，就其本身而言，它有着鲜明的社会主义特点和典型的犹太民族特色，闪耀着集体价值与人类理想的光辉，为以色列的建立和发展以及向工业化社会过渡作出了独特而重要的贡献。今天，基布兹作为以色列这个“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个社会主义细胞”，并作为人类为之奋斗的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单位、朴素形式和特殊范例，我们必须予以深切的关注并加以科学的分析和深入的研究。

基布兹亦称社会主义基布兹，原指整个巴勒斯坦地区的一些犹太人集体定居点，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变化，基布兹已经成为以色列现存的主要社会组织形态之一。汉语中的“基布兹”一词是根据希伯来语“Kibbutz”音译而来，原来的含义是“聚集在一起”或“集体”，

现在一般称之为“集体农庄”或按中国的习惯称为“公社”。基布兹的形成与现代巴勒斯坦出现的一个接一个的犹太移民浪潮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早期的移民几乎人人都经历过所谓“集体化”的阶段，而移民度过的这种程度不同的集体生活基本上是日后出现的基布兹生活模式的雏形。对基布兹运动产生深远影响的思潮主要是社会主义思想、犹太复国主义理论以及回归自然、平等共济的观念，这些影响的存在不仅使 20 世纪 20 年代生活在基布兹中的犹太拓荒者在总体上确定了基布兹的基本性质、组织形态、生活方式、经营方式和所实行的基本原则，而且还在意识形态领域影响着生活在基布兹中的成员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

从政治上讲，以色列是一个地道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其社会结构的多样性充分体现出这个历史短暂、地域狭小而又政治稳定、发展迅速的国家的开放程度和组织特点。其实，犹太人（至少是其中的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初衷就是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犹太民族家园。在以色列《独立宣言》中，曾明确指出在完成恢复犹太民族家园这一民族目标的同时，实现把以色列建成一个“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这一阶级目标。这一建国方针基本上坚持了下来，尽管 1977 年右翼政党联盟利库德集团执政以后，曾宣布把以色列建成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国家，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政府的目标，但以色列的经济正如这个国家本身一样，主要还是有计划努力的产物，而不是单纯发挥个人主动性的结果。仔细的研究分析就可以发现，以色列的经济虽然不像过去的众多社会主义国家那样是由中央统一计划和集中控制的，但也不像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完全是靠市场力量来运作的。政治制度上的这种不统一和非纯粹性决定了经济模式和组织模式的多样性，这也正是基布兹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国内政治条件。

二、基布兹的产生和发展

1948 年 5 月 14 日，英国对巴勒斯坦的托管统治正式结束。当天，以色列国宣告成立，第一任总理本·古里安发布了《独立宣言》，并宣布了别具一格的立国三原则：犹太复国主义 + 社会主义 + 平等主义。也就是说，他们所要建立的是一个实行社会主义的犹太国家，或者说是一个实行“犹太社会主义”的国家。

其实，犹太人的道德观念与价值取向自古就与社会主义思想有颇多共同或共通之处，这是由这个民族的历史传统、发展历程与生存环境共同决定的。就近现代而言，这种所谓的犹太社会主义思想无疑是在当时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盛行的东欧，尤其是俄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下形成的。犹太人在纪元初亡国之后流散到世界各地，而欧洲一直是他们的主要聚居地，仅 20 世纪初的俄国犹太人就读 500 万之多。1905 年俄国革命失败之后，俄国以及俄罗斯帝国势力范围内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一批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年轻人不堪沙皇的残酷迫害，但却没有在革命失败的阴影中消极沉沦，而是毅然冲破阻挠远程跋涉来到巴勒斯坦。这些人认为，他们属于工人阶级，但他们却是犹太人，像任何一位犹太人一样，在各居住国只能算是外来人，不光为当权者所不容，甚至受到同属工人阶级的当地人的排斥。当时，尽管他们受到其他社会主义者（其中不乏犹太人）的嘲笑，但他们相信，犹太复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则可以融合起来，成为一个连贯而科学的思想体系，成为

他们致力建设的新社会——建立于犹太人的劳动、平等以及社会主义原则之上的新社会——的思想基础。作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先驱，他们憧憬着通过自己的劳动重建犹太国，同时，力主在巴勒斯坦重建的犹太国是一个没有剥削的自由公正的新社会。1909年，这一小股犹太移民请求犹太国民基金会让他们以集体的方式耕作，不要派传统的监工进行管理。这一要求得到批准后，他们在以色列北部的太巴列湖畔组建了第一个在自愿和互助基础上共同劳动，共享财富，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的“基布兹”，起名为德加尼亚，希伯来语的意思是“粮食产地”，以图通过开垦土地、生产粮食自立和发展，为接纳更多的犹太同胞，为创造新社会和新国家进行物质上的准备。¹

此后，一个又一个的基布兹仿照德加尼亚的模式陆续在巴勒斯坦北部地区建立起来。1911年，在梅尔哈维亚建成了第二个基布兹，到1914年，建成的基布兹已经达到11个，而到1918年，巴勒斯坦全境内的基布兹已经发展到29个。早期的基布兹是基于组成的社团必须小到能够像一个大家庭那样发挥作用这样一种观念，所以当时的基布兹规模一般较小，成员不多，最大的也不过百人左右，有些带有宗族色彩，而且普遍以农业生产为主。1921年，第一个大型基布兹恩哈罗德在伊兹生勒谷地东部建立起来，意在以组成农工经济混合的大规模集体定居点的方式构建乡镇式的独立社会，以消除城乡社会之间的差别，并最大限度地吸收更多的新移民。至此，以基布兹为主要形式的定居点在巴勒斯坦北部星罗棋布，成为移民进入巴勒斯坦后的立足点和“粮仓”，从而为建立犹太国所需要的人口多数进行有步骤的准备。

20世纪20年代，由于犹太国民基金会缺乏资金，基布兹运动的发展曾一度受到阻碍。但进入30年代，基布兹得到了迅速发展，到1939年，建立的基布兹总数已达117个，基布兹的成员人数也由1931年的4391人增加到24766人。到建国前的1945年，巴勒斯坦的291个定居点中有149个为基布兹，建国后又迅速增加到200多个。基布兹的规模不等，大的拥有2000人以上，而小的只有一两百人，刚成立的则往往只有几十人。此后，以色列基布兹的总数维持在270个左右，成员总数12—13万人，大约占以色列人口总数的3%弱，但在鼎盛时期的生产总值却占到全国的12%以上。由于新环境和新形势所带来的困难，基布兹的总人口尤其是年轻人的比例略有起伏并呈下降趋势，但最新资料表明，基布兹及其人口的数量正在回升。

1925年，在巴勒斯坦地区成立了最早的基布兹联合组织；1927年，根据各基布兹不同的政治观点，分化为全国基布兹运动和联合基布兹运动两个组织，后来陆续成立的还有宗教基布兹运动、无党派基布兹等。这些组织为后来的各种社会民主党尤其是巴勒斯坦工人党（以色列工党的前身）的建立奠定了政治和组织基础。1963年，基布兹运动联盟重新组建，形成了一个新的联合体，各基布兹组织都参加了该联合体。至20世纪70年代，基布兹的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已基本定型，成为以色列社会结构中的一种基本构成单位，是以色列的农业支柱和主要生产组织，对以色列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某种程度

¹ 早在大约16世纪，曾两位土耳其宫廷犹太人先后尝试建立一个半自治式的犹太定居点。他们购得了太巴列城附近地区的土地使用权，集体组织农垦，接纳犹太移民，并力图发展纺织业，为建立犹太国作准备，但这次实验很快就夭折了。可参见塞西尔·罗斯《简明犹太民族史》，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0—331页。

上讲，基布兹拥有自治权。政府只是代表整个基布兹运动处理各种政治和金融方面的问题，而各个基布兹本身则相对独立，具体领导农业、工业和服务性行业的生产和生活，制定自己的发展计划，并研究基布兹内部的各种社会问题。

三、基布兹的特点

基布兹的特点，可以用一个“公”字来概括。就目前来讲，基布兹可谓整个世界上也是有史以来公有化程度最高的现代组织形式之一。它的土地是公有的，属于国家所有，租期通常为49年，也有的长达99年，并且可以自动延长。它的全部财产，包括建筑物、生产设备、牲畜、产品等等，全部是公有的，或者说是共有的，不属于任何个人或家庭，而是属于全体成员。它的经营管理奉行直接民主原则，由全体成员共同参与决策。全体成员必须参加劳动，并且不存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也不分工作性质、技术水平和职务高低，一律享受完全相同的待遇。“基布兹”成员过的是一种公社式的大家庭生活，全体成员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文化娱乐以及子女的抚养教育等，全部由基布兹统包下来。基布兹的目标是把自身建成一个“共同劳动、共同占有、共同生活，没有剥削、压迫，人人平等，和睦民主的理想社会”。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基布兹一直坚定不移地执行自愿、平等、民主、财产共有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可以表述为：成员自己劳动，反对雇工，反对剥削；政治上人人平等，没有特权，没有特权阶层；经济上人人平等，没有贫富差别和高低贵贱之分；男女真正平等，没有任何性别歧视；劳动和生活上的完全合作，生活集体化，家务社会化，孩子由基布兹集体抚养，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基布兹内部不流通货币，没有个人财产，没有报酬上的差别，消除了两极分化。基布兹的“公有”特点通过其奉行的一系列原则充分体现出来。

1. 自愿

基布兹是一种自愿组合，加入基布兹必须是自觉自愿的行动。申请加入者要承认和遵守基布兹的章程，比较熟悉并愿意分享基布兹的生活方式，同时往往需要经过为期一年的考察期，然后经基布兹（成员大会）批准，才能成为正式成员。基布兹还规定了“退出自由”的政策，可以自动离开或提出申请脱离基布兹，与该基布兹脱离关系。退出的成员即成为自由人，可以加入其他的基布兹，也可以另找出路。这种自愿的原则体现了个人意志的选择自由，乃是基布兹保持其稳定性和生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2. 平等

所谓平等，指的是所有的基布兹成员一律平等，包括政治、社会和经济地位上的完全平等。各成员对基布兹的方针、政策以及生产、经营、生活等方面的活动享有同等的表决权，无论所从事的是何种性质的工作，生活水准和福利待遇都是完全平等的。在基布兹里，无论书记、委员会主席、厂长、大田劳动者、工程师、饲养员、会计，还是更一般的附属人员，待遇一律平等，绝无例外。如此彻底的平均主义，可以说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因而有人曾非常羡慕地认为，基布兹具有前苏联所未曾达到的那种更纯粹的集体社会形式。就现实中的社会形态而言，这种神话般的平均主义并无合理性，但基布兹这种组织形式历时近一个世

纪，作为一种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分配原则，或许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无法比拟，恐怕只能用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形式的多样性和犹太民族思想观念的独特性来解释了。

3. 民主

基布兹实行的是泛民主原则，即大多数人的意志便是基布兹的意志，一切重要的决定只有在大多数人表决同意后才能付诸实施。基布兹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它的代表大会，由全体成员组成，实行一人一票制，成员享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根据民主原则，基布兹的事务由全体成员参与经营管理。所谓参与内部管理，一是每周召开民主大会一次（通常在周末），由全体成员共同讨论有关经营方针、审核预算、选举负责人、批准吸收新成员等方面的重大问题；二是成员轮流参加各种管理工作；三是全体成员在执行委员会任期内有权举行信任投票，随时撤换不能胜任的领导者。基布兹内部遇到问题时，一般先由有关委员会讨论，并公布作出的决定，如无反对意见即为通过，如有异议则须交书记处或成员大会集体讨论决定。

4. 财产共有

基布兹是一个集体公有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只有土地属于国家，其余的所有财产，包括生产资料、固定资产和各种产品统统归全体成员共有。以色列土地公有制的形式是与建国前及建国后的移民政策分不开的，即源于“犹太国民基金会”的建立。为了建立犹太移民点，“基金会”筹资在巴勒斯坦购置土地，然后将购置的土地租给早期的犹太垦荒者。时至今日，这个“基金会”依旧在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圣经》中有关“土地永不出售”的戒律，“基金会”向垦荒者颁发为期49年的租契（49年的租期是沿袭犹太教的规定，即七年为一个安息年，经过七个安息年即49年之后，“各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并规定不得无故放弃耕种已经租得的土地，或者雇用他人代耕，否则将宣布契约作废。“基金会”之所以采取这种强制手段，是为了防止犹太移民利用土地进行投机倒把，防止土地重新落入非犹太人之手，从而鼓励犹太移民长期在巴勒斯坦定居。同时，鉴于当时犹太移民处于少数地位，从维护其安全考虑，“基金会”还规定，不得将土地租给个体户，只能租给那些以某种合作社或社团形式组织起来的农业生产集体。因此，这种做法一直延续下来，土地国有便成为基布兹的特点之一，这同时也是基布兹得以一度兴盛的重要原因。另外，由于强调财产权利的完全平等，主张集体化的劳动和生活方式，也为了避免财产私有所带来的贫富差异和两极分化，一切财产归集体公有便成为基布兹所奉行的基本原则。

5.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基布兹全体成员在衣食住行、医疗卫生以及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基本上是按需分配，各取所需。如：在穿衣方面，基布兹设有衣物供应中心，成员所需的衣物可从中心选取，衣物的洗烫与缝补亦由供应中心负责。初期的基布兹，其成员的服装按性别、年龄、规格统一发放，如今随着生产的发展和条件的改善，各家可到基布兹开设的商店里自行挑选，登记备案后即可取走。在饮食方面，每个基布兹都设有公共食堂，并且一般设备齐全，宽敞明亮，兼做大会会场。成员一日三餐在食堂中用餐，采用自助餐形式，各取所需。基布兹内部不流通货币，各供应点的物品按每户人口记账分配方式领取，住房按每户人口多少由基布兹统一分配等。基布兹成员年老体弱、伤亡病残均可得到免费照顾和治疗，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则

进养老院，由专人照顾。至于子女教育问题，则根据年龄划分教育阶段，一般1—3岁进托儿所，4—6岁入幼儿园，以后则依次进入基布兹自办的小学和基布兹地区中学。同时还规定，凡年满18岁的男女青年，须在服役期（男3年、女2年）后才能报考大学。为了培养和强化集体主义意识，减少父母的家庭负担，增加父母一辈的学习时间，子女从托儿所一直到大学，除工余、周末和节假日外，长期实行与父母分居的制度，而青少年在接受各阶段教育期间，一律由基布兹负责，享受免费教育。

6. 社会化服务

基布兹的社会化服务程度极高，具有完善而齐全的社会和生活服务设施。基布兹是一个自成系统、相对独立的社区，俨然是一个微型社会，成员基本可以做到不出基布兹，一切基本生活需求均可得到满足。今天的基布兹内部一般既有农场又有工厂，既有果园又有畜牧场，既有银行又有旅游业。实际上，基布兹既是一种农业基本生产单位，又是一种社会基层组织形式，同时也是一种平战结合的准军事组织，肩负着安全防卫的任务。特别是从基布兹初创时期到建国初期，基布兹成员一直是土地的护卫者和国家武斗力量的中坚，他们一手拿枪，一手扶犁，为国家的安全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所以，今天的基布兹实际上是一个农、工、商、军一体的社会基层组织。

基布兹这些独特而鲜明的特点成为模式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之瞩目和试图借鉴的因素，同时也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高度关注。在一个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中，基布兹得以保留下来并实现了持续稳定的发展，成为现实中的现代神话，不能不让人感到惊奇，甚至会产生怀疑。但这种神话又的确是一种现实，透过这种存在的表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充满生机并把理想与现实结合在一起的集体，它们的成员正在用自己的劳动和成果，以朴实无华的方式探索一条实现人类美好理想的实践途径。

四、基布兹的思想渊源

研究一种事物特别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事物，首先应该去探求它赖以产生和存在的思想根源。可以认为，基布兹运动主要是在社会主义思想、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和犹太教中倡导的平等、共济、集体、劳动等进步观念的影响下形成的。基布兹是典型的“犹太事物”，融合了西方工业社会与东方农业社会的诸多特点，具有鲜明的犹太特色和时代特征。它是朴素的、务实的，但更是先进的、向上的；它是局部的、安静的，却又是强大的、热烈的。在一开始，它只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神话，但如今却是代表着一种实在的理想。它是以色列大社会中的一个小社会，一个有着特殊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小社会，是生长在以色列这副以西方资本主义体制为政治骨架的社会肌体上的一个充满社会主义精神的健康细胞。

1. 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之后，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就一直在探索能够真正实现这一理想的实践形式。到19世纪末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兴起，其中欧洲尤其是东欧地区由于自身独有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地理条件，这种探索的过程显得更加急迫、认真和多样。正是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犹太复国主义在欧洲出现了。毋庸讳言，这种复国主义

尽管带有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但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无疑在其复国方针中占有一席之地。“犹太复国主义者无疑受到 19 世纪下半叶流行于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梦想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建立一个基于社会公正、开明和宽容的社会，而基布兹这一稳固而持久的生产组织形式正是实现其复国目标的创造性途径。这一思想融入了犹太复国主义理论之中，这不仅表现为伊休夫¹ 当时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而且在当时极力主张犹太—阿拉伯对话的重要思想家马丁·布伯身上体现出来”^{[2] (P197)}。当时，在整个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以主张社会主义的“工党犹太复国主义者”势力最大，所以在 1948 年建国时，工党顺理成章地成为执政党。直到 1977 年的 29 年中，以色列一直是由工党为首的左翼政党联盟执政。以色列工党自称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党”，曾一度加入社会党国际，政治上主张在以色列实行“建设性的社会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即在实行民主和人民广泛参与的前提下，谋求实现整个民族和各个阶级的目标。在经济方面则主张实行“混合经济”，即政府企业、以色列总工会所属企业和私营企业“全部发挥重要作用”，“在多年计划的基础上对经济实行中央集中的计划和指导”。可以说，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推动了基布兹的建立与发展；反过来讲，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立国原则也正是在早期基布兹运动的思想与实践的基础上发展而形成的。

基布兹运动的思想发源地也是在东欧，其产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可以说是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形式之一。基布兹的产生和发展与俄国社会主义的准备和实践阶段几乎是同时进行的，称得上是一次东方式的移植和可贵的尝试。工党或工党联盟的前身是巴勒斯坦工人党，而该党的基础则是犹太工人总工会和基布兹，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属于左翼。当时，在复国先驱的队伍里，既有社会民主党人，也有马克思主义者，甚至还有一些斯大林分子，但开展社会主义运动、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是他们的共同理想。他们鄙视并摆脱了那种乌托邦式的空想，决心以原始朴素的行动，使社会主义的理想与犹太复国主义的民族目标结合起来，彻底改变犹太人那种“贪婪的小商人”和“高利贷者”的不雅形象，主张培养和造就犹太工人阶级，使之成为建国立国的中坚力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第二次阿利亚^④ 期间，犹太人大量移居巴勒斯坦。当时的巴勒斯坦几乎没有任何现代工业，农业是新移民谋生的主要手段，而头两次阿利亚的移民最初采取个体经营方式从事农耕，但个体农业很快就失败了。因为移民在原居住国很少有人务农，普遍缺乏农耕技术和经验。此外，巴勒斯坦的自然条件也不适于原始的耕作，并且当地的阿拉伯人对犹太移民怀有敌意，常常阻挠他们的生产和生活。这些不利因素是一家一户的力量所无法克服和抵御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来到巴勒斯坦的移民，大多数先后离开了巴勒斯坦，坚持下来的少数人，一部分经营农场，雇用阿拉伯农民进行生产；而另一部分人则坚持着社会主义信念，同时也为了依靠集体力量战胜不利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开始选择具有集体所有、互助合作性质的生产组织——基布兹，这一选择与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不谋而合。

为了把更多的欧洲犹太人吸引到生存环境比较恶劣的巴勒斯坦，并鼓励他们从事体力劳

¹ 希伯来文为 Yishuv，即以色列建国前的巴勒斯坦犹太人社区，是一个具有自治性质的政府式管理机构，其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工党手中。

^④ 希伯来文为 Aliyah，意指犹太人向巴勒斯坦地区的移民潮。在近代，曾出现过五次阿利亚：第一次 1882—1903 年；第二次 1905—1914 年；第三次 1919—1923 年；第四次 1924—1928 年；第五次 1933—1939 年。

动，就必须创造一种能够保障犹太劳动者拥有较高社会和经济地位的条件。在当时，个体经济已经完全失败，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场出于其经济本性，大量雇用阿拉伯人而很少雇用犹太移民，因此它既不能有助于确立犹太人的多数，也不能显著提高少数犹太雇佣工人的地位，惟有社会主义集体性质的合作经济组织才能满足犹太复国主义和那些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移民的需要。由于 1920 年成立的巴勒斯坦犹太工人总工会，主要根据确立犹太人口多数和保障犹太工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政治需要，而不是从市场经济法则出发经营企业，使移民得到充分就业，为会员提供了一套从摇篮到坟墓的完整福利体系，从而使集体经济成分在 20 世纪 30 年代对私营经济占据了压倒性优势。因此，建国后的公有制经济成为以色列的经济基础，而在农业经济体制上避免了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

2. 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驱动

以色列建国之前，复国是全世界所有犹太人的第一目标和主要信念。可以说，正是有了犹太复国主义，有了犹太复国主义所提出的政治纲领和建国方针，才使基布兹的建立成为可能，而正是由于基布兹的建立和发展，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思想和物质基础，才为犹太复国主义的成功和以色列的建立铺平了道路。

正因为如此，建立基布兹及其组织体系成为几代犹太人的理想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具体行动。从亡国之后就已经孕育和萌发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终于在 1897 年随着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召开而化为具体行动。会议通过的《巴塞尔纲领》明确宣布，“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由公共法律所保障的犹太家园”，而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制定的四项具体措施中，第一条就是“不断鼓励犹太人大规模地向巴勒斯坦移民定居”。在犹太复国主义的旗帜下，全世界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特别是其中的务实派认为，犹太人对故土的权利是历史的、自然的、天赋的、与生俱来的，因此向故土移民并在那里兴办犹太事业（如基布兹）是建立犹太民族家园的惟一途径，也是最后的理智选择。

以色列前总理梅厄夫人曾说过，“没有移民，我们何来国家”，也就是说，没有当时的犹太移民运动，就没有今天的以色列。人口是国家赖以产生的基础和首要条件，因此，犹太复国主义总委员会曾规定，作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必须具备四项条件，除了应该学会希伯来语，谙熟犹太教义和在家中恪守犹太教规，在社会上为犹太复国主义利益而奋斗之外，首要条件是本人应移居以色列，并协助任何犹太人通过各种途径移居以色列，从而使“没有土地的人民回到没有人民的土地上”¹，造成人口多数的既成事实。所以，早期的移民所建立的基布兹正是满足这一条件的最佳途径，它不但使移民过上平等共济的生活，体验到“国家”和“集体”生活的坚实感和安全感，而且通过建立这种集体性质的定居点，不断吸引和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这本身就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建国宗旨和步骤之一。所以，在基布兹的带动下，世界各地的移民蜂拥而至，并且纷纷效仿这一做法，加入了基布兹运动。在 1917 年英

¹ 犹太复国主义者最早的政治口号之一。其实这一提法是荒唐的，至少是不准确的。尽管人们当时曾普遍认为 19 世纪末的巴勒斯坦乃是一片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但阿拉伯人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然，这一口号是针对犹太人提出来的，旨在鼓励他们向巴勒斯坦移民。

国政府发表《贝尔福宣言》¹，赞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的时候，巴勒斯坦境内只有不到 5 万犹太居民，而到 1948 年以色列建国时，犹太人口已经接近 60 万。为了执行犹太教的古老诫命，为了能够在故土上学习《托拉》^④，为了能够安葬在神圣的土地上，为了弥赛亚的早日降临，更为了民族的振兴和祖国的建立，犹太人从四面八方拥向巴勒斯坦，在那里扎根落户，发展合作事业，建立互助社团。基布兹作为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具体体现，在把这块土地建设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犹太家园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犹太人口比例的迅速提高这一既成事实成为发表《独立宣言》的重要前提和必要准备，以色列国在成立之前就已经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犹太国家”了。

3. 平等观念的升华

犹太人的平等观念起源于原始的平等共济思想。在古代，按照犹太教的教规，就有所谓“禧年”（每 50 年为大喜之年，称禧年）之说，据《圣经·利未记》记载，禧年是上帝为以色列人订立的。每逢禧年，要给所有的居民宣告自由；各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奴隶一律释放，准予自由；等等。犹太人普遍认为，世界是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即学习、祈祷和慈善。《圣经·箴言》中说：“送给穷人就是贷给主。”犹太人主张帮助邻人、资助他人、同情弱者，崇尚利益共济和财产共享，以成为“雅各家”^④的一员为荣，无论是和平年代还是危难时期，要联合整个“大家庭”一起“向前走”。

在近两千年的流亡岁月里，西方的犹太慈善家赢得了国际声誉，他们资助各种犹太事业和世俗事业，为复国大业特别是犹太移民捐款，在巴勒斯坦以及其他地方购置土地，帮助建立基布兹，为建设自由平等的犹太家园作出了重大的物质贡献。犹太人在经历了长期的颠沛流离、背井离乡的流亡生活之后，更加怀念那种原始的平等关系：共同生活，和谐共处，没有剥削，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人人平等。所以，怀着这种平等的梦想和复国的热忱，他们来到了巴勒斯坦。但在当时，他们虽然在犹太基金会的帮助下拥有了贫瘠的土地和简单的生产资料，却势单力薄根本无法抵御来自自然和人为的侵害。要想克服当地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异族的“厌恶情绪”，就必须组织起来，集体劳动，集体生活，集体防御，这是生存的需要，同时也是犹太人长期养成的平等共济思想的必然结果。

基布兹是典型的犹太平等观念的产物，基布兹之母——德加尼亚的创建者提出的基布兹口号是：主宰自己命运，实现人人平等。早期的基布兹成员的确把劳动视为第一需要，辛勤劳作，不计报酬，和衷共济，集体利益高于一切，过着一种社会主义大家庭式的生活。平等的原则是基布兹的灵魂，它贯穿于基布兹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真正实现了人人平等。在政治上和社会地位上，不管原来是地位显赫的政治家（如以色列第一任总理本·古里安）、成就卓

¹ 即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亚瑟·贝尔福代表英国政府发表的宣言。宣言表明了英国政府原则赞成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的立场，标志着犹太复国主义正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和支持。但该宣言对如何建立犹太民族家园，以及建立什么性质的民族家园，却无实质性的表述。

^④ 希伯来文 Torah 的音译，意为“指引”。原指《圣经·旧约》的第一部分即《摩西五经》，后犹太人以“托拉”代表犹太《圣经》，现则泛指全部的犹太律法、习俗和礼仪。一般来说，在犹太人的心目中，“托拉”代表着所有犹太经典中最重要的部分。

^④ 指整个犹太民族。雅各是亚伯拉罕的孙子，又名“以色列”，被后世的犹太人尊为第一代祖先。所以，《圣经》中的这一类提法类似于把中华民族称作炎黄子孙。

著艺术家（如亚西尔·谢米），还是著名的学者（如阿巴·埃班），只要回到基布兹，成为基布兹的成员，就要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做“低下的服务工作”，如打扫卫生等。在经济上，基布兹的物质给予不是劳动所得的报酬，不是能力和贡献的物化，而是生活的需求。在分配过程中，不存在形式上的平等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的所谓“资产阶级法权”。基布兹还一改数千年的旧习，真正实现了男女平等，家务劳动社会化，抚养子女集体化，使妇女彻底从传统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和男子一样享有完全独立的地位。这一点成为《独立宣言》以及建国后一系列法律有关男女公民享有“完全平等的社会地位和权利”条款的基础和准备。

4. 集体价值的体现

犹太人强调和崇尚集体价值，认为只有通过集体的力量，才能“使不可能变为可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目的就是整个犹太民族的自新，这一运动以及后来建立起来的政权，所看重的是集体而不是个人，强调的是共同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利益，主张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长期失去祖国和民族根基的悲惨遭遇更加强化了这种集体价值观念。读一读以色列的《独立宣言》，根本找不到任何提及个人的地方。对于犹太人来说，从小就熟悉和体验集体生活是十分重要的。观念是集体的，各种活动也是集体的，甚至受苦受难也打上了集体的烙印。一个犹太人对另一个犹太人所表示的最高敬意，就是把他称作“真正的伙伴”，这个词的意思是：这个人不但是集体的忠实成员，而且把集体的利益置于个人的利益之上。

据《圣经》记载，亚伯拉罕曾带领族人进入迦南，从此就结束了游牧生活，抱成一团而在“希望之乡”开始了农耕生涯；后来，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西奈旷野中游历了40年，据说没有一个人自行离开群体。上帝是同以色列人这个集体立约的，先知们告诫的对象也多半是集体，即整个以色列民族。公元70年耶路撒冷沦陷后，近千名犹太起义军拒不向罗马人投降，依靠集体的力量在死海岸边的马塞达要塞坚持两年有余，最后集体自杀殉国。这种强调集体和集体凝聚力的思想甚至表现在祈祷方面，传统的祈祷仪式需要一个法定的人数，即10名成年男子。在犹太教中，“以色列民”的思想占有重要地位，但这并不是说个人无足轻重，而是说个人应该对民族、对集体负责。所以，这个民族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凝聚在一起的集体。在流散到世界各地之后，他们总是也只能是在居住国的各个属于自己的社区中生活，即使在“隔都”甚至纳粹的集中营里，他们始终是一个融为一体的群体。集体对于犹太人的重要性就像探险者和遇难者必须共同行动一样，是一种谋求生存和自我保护的需要。但是，犹太人强调集体，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追求和崇高的理想。那些最早来到巴勒斯坦的犹太拓荒者，就当时的自然与社会环境而言，仅凭个人的力量当然是无法立足的，只有以基布兹这样的方式把个体的力量集聚在一起，才能实现民族的目标，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犹太人特别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强调通过犹太民族的复兴来发挥个人的才能，集体是第一位的，同时鼓励个体犹太人在集体中确立自己的个性，体现自己的价值。所以，与一般集体社会中个人的那种默默无闻和相互疏远不同，基布兹使每个人感到自己在集体中有一席之地，为大众福利起着一份作用，如果自己出现困难和不幸，集体就会对他负起责任。这就是基布兹成员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产生的相互义务。

虽然犹太神话中有许许多多的个人英雄主义行为，但这些英雄是由于他们为集体、社会、民族所作的贡献而受到崇敬和颂扬的。对于那些为自己积累了巨大财富的个人，按照犹

太人的道德准则是根本不值得人们效法和称颂的。也就是说，犹太人虽然也主张个人奋斗，但这种奋斗只有同集体和整个民族联系起来，才是高尚的和有意义的；而在共同奋斗的过程中，个人的精神才能得到升华。在当今的以色列，由于各自由派政党历来强调个人的作用和权利，因此难以在选民中得到广泛的支持；选民还是普遍喜欢强调集体的政党，不论它本身是左派还是右派。尽管集体就意味着义务，意味着付出和负担，但在犹太复国主义的旗帜下，个人的付出和负担才能换取集体、民族的收获与光荣。

犹太人的这种集体价值观正是犹太社会主义运动，同时也是基布兹运动产生的重要思想基础。有了这样的价值观，个人才会由于参与了一项神圣的事业而获得一种自豪、信心、希望和成功感。

5. 劳动最光荣

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就是劳动，因为只有通过劳动，才能生存和发展。犹太人是一个勤劳而勇敢的民族，喜欢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用劳动的汗水浇灌丰收的果实。在古代，犹太人把耕作看作是神的旨意，是一件圣事，是生命之本、民族之根。所以，他们的许多节日都与农业收获有关，如住棚节本来就是农人喜庆丰收的日子：每当地里的庄稼都已收割完毕，场上的粮食都已进仓，摘下的葡萄已酿成美酒，农人就开始举行庆祝活动，在果园或葡萄园里用葡萄、无花果等七种植物枝条搭起临时棚舍，在他们的田地里和棚舍中度过收获季节的最后几天，以感谢上帝的恩赐。但是，当犹太人流散到世界各地之后，犹太民族却成了一个与土地分离的民族。他们不仅丧失了祖国，而且在各居住国作为异邦人几乎没有任何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地位，所以也就根本没有土地。在整个中东、北非、欧洲甚至北美地区，几乎全世界的犹太人都不再熟悉和耕种土地。犹太人被迫与土地分离的时间是如此之久，以至于几乎丧失了耕作的意识和技能。他们已经成了商人、放债者、小手工业者和小商贩，只能从事“庇护国”在法律上允许他们从事的职业，从而剥夺了他们田间劳动的天赋权利。

犹太人对土地已经完全陌生了，他们俨然成了一群没有根基、四处漂泊的乌合之众。所以，犹太复国主义的先驱们认为，要再次复兴正在衰弱和消亡的民族，首先要实现人民与土地的重新结合，回到属于自己的土地上从头开始。亚伦·大卫·戈登¹则鼓吹犹太民族要成为一个“劳动的宗教”，他说：“我们是由于缺乏劳动而被打败的，只有劳动，才能使我们恢复健康。我们必须把工作置于我们一切希望的中心，我们的整个结构必须建筑在劳动之上。”他认为，在同土地和手工劳动脱离了近两千年之后，犹太人除非把他们的全部力量引导到劳动上——“靠这种劳动，一个民族才得以根植于他们的土地和他们的文化之中”——“他们就不能成为一个生气勃勃的、自然的、从事劳动的民族”。这种原始朴素、回归自然的哲学，重新肯定了劳动的价值及其对民族振兴、国家复兴的重要作用，鼓舞了几代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放弃了舒适和奢侈，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他们喜欢用希伯来语唱

¹ Aaron David Gordon (1856—1922)，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哈鲁茨（犹太复国主义先锋）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他出生于乌克兰，1904年移居巴勒斯坦。受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和美国作家、思想家梭罗的影响，主张把个性的自我完善、承认个人的价值、接近大自然和从事农业生产作为改善世界的途径。戈登的核心思想是“劳动”，并特别推崇农业劳动，把自觉从事劳动看作直觉地理解上帝和神秘地知觉上帝的一种手段，因此他的世界观被称为“劳动宗教”。他反对私有制，但拒绝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远离大自然，是城市生活和工业生产的产物，强调只有农业劳动才能保障人与土地、自然和宇宙的有机联系。

着：“我们来建设这块土地，同时用这块土地来建设我们自己。”他们决心通过工作和劳动来建立起与土地早已生疏的感情，在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的同时，提高犹太民族的生产能力。他们十分自觉地通过耕种土地来赎回土地，并在这个过程中为自己赎罪，并认为这是犹太人必须亲身经历的过程。所以，在早期的拓荒者中间，尤其是在基布兹里，人们形成了这样的共识：让土地荒芜本身是一种无知、无能和浪费，而劳动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而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劳动和劳动者的概念在犹太人特别是早期移民的伦理观念和经济思想中占有很高的地位。早期的移民在原来的居住国大都已经被迫脱离了体力劳动尤其是农业劳动，他们回到这块终日向往、熟悉而又陌生的土地上之后，必须通过劳动特别是农业劳动来生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自己改造为劳动者阶级，扎根于土地之中，在经济和就业领域为实现犹太人口多数创造条件。于是，“土地与劳动征服”的口号开始流行，犹太人通过劳动制造出一个犹太工人阶级。犹太垦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下的产物，基布兹运动形成之后，私人资本受到限制，从而避免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否则，在当时的环境下，社会的两极分化和激烈的阶级斗争势必会导致犹太劳动者的普遍贫困，很可能使巴勒斯坦失去对散居各地的犹太人的吸引力，社会主义犹太家园的复兴和巩固就会成为一纸空谈。

五、神话的解读

基布兹这种接近神话的现象之所以引人瞩目，并不是由于这种组织形式本身及其今天在以色列社会中的重要性，而在于人们能够通过对这一神话的解读，对这种组织形式的分析研究，可以得到一些具有启发性和特殊意义的东西，甚至借鉴其中的现实经验来改进自己本身的社会组织。科学社会主义从诞生起已经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时间，付诸实践也已经有近九十年的历史。在这期间，经过若干代人的努力，社会主义理想与实践运动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有辉煌也有低沉，有神话也有幻灭，而寻找社会主义的农村生产组织形式一直是社会主义者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积极探索而又始终难以找到答案的一道难题。多少年来，我们对以色列一直是陌生的，对以色列现存的独特农村组织——基布兹几乎谈不上什么了解，客观性的研究就更无从谈起。这当然与我们当时对社会主义概念的认识以及国际大环境有关，更与我们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审视角度有关。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进入了一个回顾、总结、反思的时期，而我国正在按照邓小平同志指明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姿态进行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广大农村在经历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欣喜与阵痛之后，正在走上联合互助、集约化经营的道路，近来出现的一些所谓“明星村”正在通过工商贸一体化探索新的农村公有制、集体化模式。所以，在探索社会主义的生产组织形式尤其是农村生产组织形式的过程中，对基布兹这一犹太事物进行深入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有意义的启示

(1) 基布兹是一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形式，并且是高级阶段的组织形式。尽管基布兹建立之初崇尚回归自然，并以民族自新和国家复兴为己任，但它的产生、发展以及思想

观念和组织结构本身，均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实际上是一种民族社会主义的产物。与其他一些国家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后产生的基础生产组织形式不同，基布兹只不过是少数理想主义者自发探索的“国家”雏形。尽管如此，按照公认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界定，财产公有、人人平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邓小平同志也曾说过，“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精辟论述是针对当时我国正在建设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言的，但同样也适用于基布兹。因为基布兹正是一个生产力高度发展，没有剥削，没有贫富差别，实现了共同富裕的微型社会，只不过相互之间在规模和程度上有所差异而已。因此，有些人也把它直接称作“社会主义基布兹”。其实，在形式和结构确立之后，衡量社会主义发展程度的惟一标准就是“共同富裕”，而这正是基布兹的既定宗旨和目标。

(2) 基布兹是一个特殊群体在一个特定地域、特定时期和特定环境下对理想社会的一次尝试性实践活动。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之后，甚至在诞生之前，世界上从来不乏社会主义实践活动的例证：欧文的“新村”就是众所周知的一种试验形式；十月革命后，苏联的集体农庄，我国大跃进时期的人民公社，甚至资本主义国家也出现过一些集体性质的农场联合体。诸如此类的组织形式大多未能生存下来，有些则只是昙花一现，究其原因，除了方式、时机和环境等因素外，更主要的原因恐怕只能深入到犹太民族本身中去寻找。根据前文的分析，犹太人长期流散世界各地，没有祖国，没有土地，犹太复国主义者借用了进步的社会主义思想，激发民族意识，鼓励移民以集体的方式定居、组织生产和生活；这一方针，正好同当时受到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一代犹太人的价值观相一致。基布兹之所以历久不衰，蓬勃发展，正是犹太民族性与社会主义思想融合的结果，是迫切的自身需要和特殊的外部条件相结合的产物。从这一点来看，基布兹并不具有普遍的意义和广泛的适用性，如果片面夸大这一现象，把它看成一种通用的模式，就会重犯“大跃进”的错误，造成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灾难。

(3) 基布兹是一场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自发性实验运动。正因为是自发的，所以并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固有的模式，这也恰恰表明了基布兹的生命力与适应性。尽管各基布兹的组织形式大致相同，但人数并没有统一的规定，经营规模也没有限制，内部管理则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予以实施，成员的加入和退出完全尊重个人意愿。正是这种无框框可循、无教条可依的实事求是的组织原则，吸引了大量的成员，并使自身获得了稳定的发展。所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从本国本民族的实际出发，寻找一种适宜、务实的发展模式，是基布兹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

(4) 基布兹是一种生存方式，是原始的生存观念与近代进步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基布兹的产生是出于生存的需要，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吸取了当代的各种先进的组织、管理和生产经验，不断更新和完善，从一种原始的生产组合发展成为一个完善的农工商一体化的生产体系，从而成为国家的重要经济命脉之一，这是许多科学社会主义者所难以想象的。也许建设这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组织并不是基布兹人的初衷，因为按照犹太教教义，他们更看重这个建设过程本身，但它却的确是以社会主义事物的面目出现的。基布兹从无到有，其间没有经历任何革命、革新或改良等替代性的剧变过程，但它却孕育了一个工

人阶级政党，帮助建立了一个国家，并曾一度影响和制约着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这一点同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经历——先建立政党，然后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最后建立国家，确立制度——完全相反，是典型的古老东方思想与当代进步理论的互补性结合。以色列的基布兹既证明了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的巨大生命力，也证明了社会主义组织形式的丰富多彩。

(5) 基布兹是一种以原生态农业为基础的农村生产组织形式。其实，以色列从建国开始实行的就是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所以，尽管基布兹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但却远远不能代表以色列的政治实质与外部形象。以色列是一个复杂而又令人困惑的国度，它历史短暂，却有着丰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积淀；它在国际社会曾一度极为孤立，却在国际舞台上尤其是中东地区发挥着重要作用；它经济基础薄弱且又战事不断，却早早步入了现代化国家的行列……但正是由于以色列复国于当代环境之中，它的政治与经济体制、社会组织与结构因此受到过多的现代因素影响，有太多的模式可循，也就等于没有模式可循。为了生存和发展，以色列不得不容纳多种多样的生产组织形式，基布兹就是其中之一。基布兹只不过是这个庞大的资本主义躯体上的一个社会主义细胞，虽然代表着一种进步的观念和理想的社会，却不能为其他国家所移植和利用，甚至也无法推广到本国的工业生产以及其他领域。联想到各社会主义国家一度在农业方面所采取的方针政策和遇到的困难，这也为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是否只有原生态的农业和朴素的平等共济思想可以接纳，或者说适宜科学社会主义的东西？就此而言，任何过分夸大基布兹的影响和作用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甚至是危险的。

今天，我们认识和研究基布兹，是为了吸取附着在它身上的那些有益的东西，以便滋养、补充和完善自己，建设我们本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就目前来讲，我们对基布兹及其现象还谈不上研究，真正的理论探讨性文献几乎是空白，这是一种疏忽，抑或说是一种失误。理论上的研究并不是目的，最重要的是要付诸行动，用实际行动促进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基布兹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支特殊力量，笔者希望通过对这一现实中的神话进行理性的解读，能够有助于开阔眼界，从而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和借鉴工作。而当我们所面临的这个神话重新回到现实之后，也许会引发更多的思考和脚踏实地的努力。

参考文献

- [1] Martin Buber, *Paths in Utopia*.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td., 1949.
- [2] Eli Barnavi, *A Historical Atlas of the Jewish People*. London: Cuperard, 1992.

(责任编辑: 黄登学)